

话语的修辞、 变异及重构

——新时期初期文学话语问题研究

● 宋文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话语的修辞、 变异及重构

——新时期初期文学话语问题研究

● 宋文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语的修辞、变异及重构 / 宋文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004 - 9125 - 5

I. ①话… II. ①宋… III. ①文学语言 - 研究 IV. ①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9158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177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1)
二 课题研究现状分析	(4)
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8)
 第一章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重构的最初努力	(11)
第一节 文艺政策的调整与“文化大革命”话语的扬弃	(11)
第二节 回归“十七年”与想象“新时期” ——“主流”话语的定位	(15)
一 “现代化”与历史叙述的“空白”化	(16)
二 回归“十七年”——另一种话语逻辑	(19)
 第二章 苦难叙事中的话语修辞与话语冲突	(24)
第一节 对苦难的消解与“拯救”	(24)
一 “伤痛”描写与“苦难”叙事	(25)
二 “忠奸对立”与时间切分的方法——历史罪责的处理	(28)
三 关于“忠诚”的叙述——革命伦理的浮现	(32)
四 身份的政治——政治拯救叙述中的主体问题	(37)
五 英雄与人民——苦难叙事中的“消解”机制	(39)
第二节 对“拯救”的怀疑、偏离与拒绝	(46)
一 暴露与谴责——“破禁”式的书写	(46)
二 伤痕与苦难的个人化呈现	(50)
三 拯救的拒绝与启蒙主体的出现	(54)
四 个体化书写的成就和限度——《晚霞消失的时候》	(58)
第三节 “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等级“规范”与话语“突破”	(71)
一 “主流”批评的“等级化”原则	(73)
二 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	(78)

第三章 人道主义的话语冲突	(84)
第一节 “态度的同一性”背后的分歧	(84)
第二节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	(87)
第三节 对“人”的主题的反思、表现及争论	(94)
一 对人的“异化”的书写	(95)
二 群体蒙昧的历史思考	(99)
三 对小说创作中“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	(104)
第四章 作家创作中的话语认同及矛盾	(110)
第一节 话语的合法性与认同问题	(110)
一 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合法性”话语	(110)
二 “合法性规范”与话语认同	(112)
第二节 对历史主体的自我书写	
——“右派”作家创作中的话语认同与矛盾	(115)
一 “归乡者”的身份与“归乡”叙述模式	(116)
二 “忠诚”表白	(120)
三 内在的话语矛盾	(123)
第三节 “知青”作家创作中的话语认同困境	(125)
一 从“控诉历史”到“回归历史”	(126)
二 “英雄”叙事	(129)
三 “知青”的“归乡”	(132)
第五章 话语的分流	(138)
第一节 意识形态话语内部的差异和分化	(138)
第二节 启蒙反思的深化与面临的话语难题	(143)
一 批判性的“历史诊断”	(144)
二 民粹主义——难以绕过的话语难题	(147)
三 启蒙话语的两歧性	(150)
第三节 “现代化”想象中的话语权力问题	(154)
第四节 话语格局与话语关系	(158)
结语	(165)
参考文献	(173)

绪 论

一 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话语转型和重建的过程。“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一系列口号的提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重新调整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很快地抛弃了“文化大革命”旧的思想文化观念和话语体系，文学创作中启蒙思潮的兴起和“人道主义”问题的重新探讨标志着启蒙话语的重新崛起；“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又使这一话语转型和重建有了现实的政治依据和目标指向。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中国社会正在以迅猛的步伐经历着一场思想的巨变和话语的重建。

但是，任何时代话语的转型与重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一过程中，话语矛盾和话语冲突又往往是激烈和不可避免的。回顾“新时期”之初（1977—1984）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时，我们不难发现，话语格局的变化和话语冲突的不断发生构成了“新时期”之初文学面貌的基本特征。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阶级/革命”叙事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话语已经被历史所否定，以“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等为特征的启蒙话语逐渐生成、壮大，并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之初话语格局中的两个主要话语力量。但是，启蒙话语的恢复、发展和壮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面临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个“强势话语”某种程度上的“规范”和挤压，因此，启蒙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不时地发生龃龉和碰撞，这构成了“新时期”之初话语重建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在这一现象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某种“尺度”和“立场”。在历史叙述问题上，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并没有深入下去，而是浅尝辄止；而在有关“新时期”文学写作的

理解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又往往力图维护“传统”的叙事资源和叙事模式的有效性。可以说,这种有意识的“尺度”和“立场”的存在,使“新时期”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面临着“禁区”和“规范”问题。所以,这些都使得“新时期”之初的几年,社会文化思潮体现出亦新亦旧、新旧杂陈的特点。一方面,历史反思和文化批判的深入使启蒙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启蒙话语日益摆脱束缚,显现出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思想活力;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规范”又限制了这一潮流的发展并在一定范围内还保持着相当大的话语影响。另外,因为长期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改造”,许多作家的话语方式还表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思想纠缠,这进一步使“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与过往时代的内在联系。所以说,在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一体化”文学告别之后,“新时期”文学并没有立刻表现出“多元共生”的面貌,这种拖泥带水、交错混杂的现象其内在原因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此,对“新时期”话语重建中的话语关系和话语格局问题的探讨是有必要的。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并不简单的时代,从而避免对一个有着复杂发生过程的文学时代作出简单化判定。

对话语关系及话语格局问题的探讨。

首先,接触到的就是历史叙述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历史刚刚过去,“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如何叙述“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如何叙述“新时期”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关系、如何为“新时期”作历史定位;进而,如何处理“十七年”以至整个当代历史与“新时期”的关系,这都是“新时期”之初重建历史叙述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直接影响到“新时期”的话语定位问题,因此,它在整个话语重建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探讨意识形态话语所确定的话语“规范”和“边界”问题以及分析两种话语是如何围绕着这一话语“规范”和“边界”展开对话、博弈的,这也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围绕着话语的“规范”和“边界”,启蒙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产生了不少分歧和矛盾,而只有对这些分歧之处和矛盾之点进行梳理和分析才能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两种话语的历史立场和话语方式。对这些“规范”和“边界”问题的

梳理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新时期”之初有关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的叙述与想象方式以及批评话语的展开方式等一系列问题。另外，启蒙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偏离”和拒绝实际上正是对自身话语立场的表达，所以，只有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和分析，我们才能勾勒出“新时期”启蒙话语重建的复杂进程。

再次，作家姿态和话语“资源”问题。“新时期”话语关系的复杂之处在于不同群体、不同作家甚至同一群体的不同作家之间都存在着主体姿态和话语认同的歧异和差别，这使得许多作家的相似创作表现出叙述立场上的微妙不同，因此，在不同个体与群体的作家那里往往就表现出话语立场的多样和复杂。另外，很多作家在推动启蒙话语的深入、表达自身历史反思的同时，也表现出话语资源的有限和叙述立场的模糊。所以，对作家的主体问题的探讨是有必要的，我们能透过“新时期”之初特殊的历史背景审视不同的作家和创作群体在话语资源的占有、话语传统的继承上面所面临的问题和具有的局限，也能通过对这种话语局限分析观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如何维护、占有“合法”的话语“资源”的。

这个课题的提出，也与我当下社会思潮的思考分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学启蒙与中国当下问题的反思一直是思想文化界争论的焦点，也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对革命和启蒙的反思中，也产生了许多偏颇的观点。例如，对启蒙与知识分子作用的贬低，某种程度上竟然呼应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思想；对“革命”问题的思考与90年代所出现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思潮形成了暗合；对某些历史概念的梳理忽视了价值立场的稳定，因此产生了不应该有的历史迷茫，等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与对当代社会问题的解释紧密相关，某些当下的社会思想问题实际上起源于“新时期”之初解决历史问题时的浅尝辄止和话语禁限。所以，我认为，对当初那个社会转型期文化历史问题的深入解剖有助于认清当下转型期文化语境中混乱的思想问题，这是我提出这个研究课题的现实思考。

此外，对“新时期”之初文学的研究，虽然成果已有很多，但是许多成果也有着很明显的局限。许多研究者或者是局限在启蒙立场内部

或者是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来评判文学,缺乏对话语关系问题的思考,因此,对许多作品的评判现在看来也就显得不太准确了。尤其是“伤痕、反思”小说,以社会政治立场的观点看,许多作品堪称“经典”,但是它们与那个时代的“问题语境”紧密相连,因此多少带有那个时代所赋予的时代特色,时过境迁之后,许多作品有待于重新评价和认定。另外,文学创作、批评与文学规范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这也是需要重新审视的课题。所以,在与“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拉开了一定时间距离之后,我们可以更好地审视那个时代的话语纠缠与话语规范,审视当时的话语力量是如何构造、想象了“新时期”的,又是如何定义了“文化大革命”的,各种话语力量又是如何展开了博弈的,在某个话语立场内部又是如何显现出差异和不同的。这是我的这部拙作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是本书意义之所在。

二 课题研究现状分析

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研究者对“新时期”之初话语重建和话语关系问题的研究往往与对“新时期”文学史主潮的分析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借用话语理论阐述问题。在对“新时期”文学史主潮的分析中,研究者们往往通过对“新时期文学”的“反思”与“现代化”主潮的认定,肯定“伤痕、反思”小说和“人道主义”启蒙话语的历史价值。在这种历史文化批评模式中,“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经常被看作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文学主潮的起步阶段,它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现代化”叙事的最初雏形,提出了文学应该反思的问题,也打破了“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思想文化坚冰。

何西来的《人的重新发现——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以及《新时期文学思潮论》,是最早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人学”复归现象进行总结和归纳的作品,何西来敏锐地发现了文学思潮的动向,并热情地对它加以肯定,指出了“新时期文学”、“人学”复归在理论和创作中双向并进的特征。

季红真的长篇论文《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从小说创作主题演变的角度概括“新时期”文学,将其基本主题表述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影响很大。与她的表述方式较为接近的是稍后发表的曹文轩的

《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曹文轩也从“反封建主义”的角度论述了“伤痕、反思”小说的内在精神主题。

刘再复在他的《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和《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等作品中，以他的“主体性”理论作为阐释依据，将“新时期”看作是走向艺术自觉和批评自觉的年代，是“人道主义”、“人的发现”和人的主体性确立的年代。因此“反思小说”对历史浩劫的追问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失落的追问以及重建的努力。这一反思过程是对50—70年代文学传统的背离过程。

宋耀良的《十年文学主潮》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文学主潮归纳为“从反思的文学到文学的反思”。在这本专著中，作者将“人的自觉”与“反思”作为新的文学思潮的发端加以历史定位。

除了这些研究者之外，陈辽的《新时期文学思潮》、陈剑晖的《新时期文学思潮》等文学史研究专著都对“新时期”之初的文学作了概括。以上的研究者基本上站在“新时期文学”对50—70年代文学的反思立场上，通过构造一种二元对立来完成“新时期文学”的叙述。文学的历史叙述体现为对过往历史的否定和反思。总体看来，这些批评家和学者的文学史叙述在对“新时期”之初文学思潮的看法上，大都肯定了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和文化启蒙意义。

与他们形成一定分歧的是，另外一些更多地体现出意识形态化立场的批评家对文学历史叙述的认定。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和张炯的《新时期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把握“新时期文学”，认为“新时期文学”是“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发扬和光大”。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治上对“新时期”的判断，因此对“新时期”之初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的判断表现出对“十七年”文学连续性的强调。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文化语境的转换，对“新时期文学”以及启蒙问题的思考更趋深入，在对“新时期”之初作家的创作矛盾、创作局限、文学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

王晓明在《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中，从当代作家的主体精神角度切入研究，他在对张贤亮和高晓

声的“心理变形”的分析中探究作家对苦难的态度以及在苦难中人的灵魂变形的问题，从而揭示了新时期之初一代作家的创作局限。洪子诚在《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从作家的“自我意识”的角度分析了几个普遍性的问题，如“感伤姿态”、“忏悔意识”，等等，有力地反思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性问题。以上两位学者对作家主体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提供了有别于文学史思潮研究的另一个角度，也是对启蒙话语所面临的问题的另一番梳理。

孟悦的《历史与叙述》是一部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多有创新的论著。她选取了“新时期”有代表性的多位作家对他们的小说展开叙述学分析，意在揭示作品的意识形态内涵和作家的意识形态潜意识，某些篇目如对王蒙和刘心武的分析是极为精彩的。孟悦对文本的话语本质有着清醒的自觉，她的研究方法对本书的写作富有启发。

孟繁华在《1978：激情年代》中，比较细致而具体地回溯了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新时期文学”主潮确立的一段历史，较为完整地反映了那一段文学历史，展现了社会与文学思潮的转型过程。董之林在《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的“附录”中，专门论述了“新时期”小说的“亦新亦旧”现象。她指出，“十七年文学”观念对“新时期”小说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新时期”小说重复了“十七年文学”中的许多主题与模式；但是，“新时期”小说在继承的同时也正在发生着蜕变，酝酿着新的艺术合成。以上两位研究者在处理“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史叙述问题时，关注到“新时期”与“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关联，其研究成果促进了我对“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关联问题的思考。

另外，尹昌龙的《重返自身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话语类型考察》较为细致地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中的话语类型，尤其是对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的评析中富有洞见。

何言宏的《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作基础，系统考察了“新时期”之初的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和话语规范问题、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以及“新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的“现代性”起源问题。展示了比较宽阔的理论视野，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史料，对“新时期”之初诸种话语的起源、关

系和格局问题展开了细致的研究。虽然在话语的分类上显得过于细致而有所重复,在论述作家的主体姿态和思想背景时有显得概括而忽略复杂性的问题,但总体上看,这部研究专著无疑是对“新时期”话语关系和话语重建问题研究的深入。

程光炜近年来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新时期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他的《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怎样对“新时期文学”作历史定位》、《“人道主义”讨论:一个未完成的文学的预案——重返80年代文学史之四》、《文学的紧张——〈公开的情书〉、〈飞天〉与80年代“主流文学”》等研究成果探讨了“伤痕”文学的“问题意识”,文学批评与主流话语的“规范”问题,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内在话语矛盾问题,等等。他的思考着重于从话语的“构造”和关系方面探讨问题,尤其对文学的制度问题和“规范”问题的研究在方法上富有启发性。

此外,近年来,李扬、旷新年、王一川、陈晓明等人也纷纷对“新时期文学”的重新评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每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都有所不同,虽然某些论断有所偏向,但是也提供了一些较有意义的成果和观点。

当然,除了“新时期文学”的研究成果之外,一些专门对启蒙思想及启蒙文学史进行研究的著作也是不可忽略的。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许纪霖的《另一种启蒙》、姜义华的《理性缺位的启蒙》、张宝明的《自由神话的终结:20世纪启蒙阐释探解》、张光芒的《启蒙论》等,这些都是研究者们在不同时期对历史上启蒙问题的成败得失的检点与反思,体现出启蒙思想史的某一侧面。其中很多命题对新时期的思想文化界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论述,为启蒙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与自我定位确定了理论依据。对20世纪启蒙文学思潮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韩毓海的《锁链上的花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张清华的《火焰或灰烬——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黄开发的《文学之用:从启蒙到革命》以及张光芒的《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等。这些作品或着重梳理启蒙话语发展的历程,或从作家角度分析启蒙的影响,都提供了思考启蒙问题的独特角度,尽管某些论者的有些观点我并不认同,

但也对本书的问题思考多有助益。

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书的研究思路受到了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研究观念的影响。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的“叙述性”是历史写作的本质特征,任何历史学家和作家都是从一定的观点出发去叙述历史的。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修撰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编年史;(二)故事;(三)情节编排模式;(四)论证模式;(五)意识形态的含义模式。在这五个模式或者说五个写作阶段中,原生态的历史事件被编排和组织,成为完整的“叙事性”故事。而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修撰者的“论证”、“解释”与意识形态立场内含其中。因此,历史写作既是一种具有叙事性的话语模式,又是意识形态的寓言。这一历史写作的“文本性”和“修辞性”的特征在本质上是与文学作品的写作类似的。海登·怀特进一步指出,如果承认历史写作的“文本性”和“修辞性”本质的话,那么,“就必须把历史写作基本看作一种散文话语来分析,然后再检验它所生成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意味着把历史话语隶属于一种修辞分析,以便揭示对现实的谦虚的散文再现下隐藏的诗意的基础结构”(海登·怀特,2003)。也就是说,对一切历史话语应该首先悬置其真实性,而从修辞性、文本性分析的角度看这些话语形式内涵的叙事模式、叙事功能和意识形态结构,这才是解读历史的真实尺度。海登·怀特的历史观是把历史解读成文学,而我们恰恰可以反其意而用之,从文学叙述中的话语组织与修辞方式入手,通过分析其叙述话语的意识形态性,解剖其内在蕴含的历史叙述观念。这一方法对于“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反思”小说应该是适用的。那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某种程度上是文学与历史意识重合和文学与意识形态重合的混合型创作,所以对它的解剖就同时具有了文学分析、历史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的多重意义。

这种致力于以“文本性”、“话语性”分析深入意识形态及历史叙述深层的思路在国内一些学者那里,已经得到系统的展开。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孟悦的《历史与叙述》就是这样的一部研究专著。在这部书的“引言”中,孟悦对自己的理论方法作了如下说明:“首先,我

接受这样的理论，即作为文类的‘历史’并不等同于事件的历史，而是话语的历史。事件的历史曾经存在，但并不应声而至，留下的是话语——对事件的叙述、记述或记述的记述。因此，我倾向于用‘历史写作’、‘历史叙事’或‘历史性记述’称呼这一文类，以便区别于‘历史自身’。其次，我以为，叙事并不是一个受文类限制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叙事可以视为一种超文类、跨文类的文体。然而叙事无法超越的只是意识形态。叙事总是意识形态性的叙事，它与历史（历史本身）的关联也总是某种意识形态关联。”（孟悦，1990）孟悦对“历史叙述”等概念的界定和叙述的意识形态性的说明是富有启发性的，它同样构成了本书理论思考的源点。

在具体操作上，本书立足于话语分析、叙述分析方法，试图阐释、梳理“新时期”之初小说创作中所呈现的话语格局和话语关系。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一句是，“话语”一词原初的含义主要是指一种比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和语言的用法。本书对“话语”一词的理解倾向于接受一位西方学人这样的定义：“话语是关涉社会、政治和文化形成的语言的用法——它是折射了社会秩序的语言，也是形成了社会秩序，以及形成了个人与社会互动的语言。”（Jaworski，2000）

本书的结构和基本内容如下：

首先，本书要探讨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努力下，“新时期文学”的话语重建的最初表现。文艺政策的调整，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叙述的界定，以及“回归十七年”理论倾向的出现都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重建话语格局的最初努力和理论方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重建努力虽然得到启蒙话语某种程度上的呼应，但更多情况下是与启蒙话语的重建努力形成矛盾和分歧的。对这一矛盾的梳理和叙述是本书主要的内容。话语重建过程中的矛盾和分歧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对于“苦难”问题的处理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倾向于运用话语修辞美化、消解苦难，而在一些以个体立场反思历史与人性的体现启蒙倾向的创作中，苦难却被暴露与反思。对苦难的不同立场同时体现在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要恢复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而一些知识分子却要回到“写真实”、“反瞒和骗”的“五四”现实主义传统中去，回到批判现实主义中去。其二，围绕人道主义问题也发生了不少冲突。创

作上,有很多作品显示出对“异化”问题和蒙昧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理论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在理论论争和创作主题论争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启蒙话语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除了对以上问题的梳理、评述之外,本书将展开对“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创作的比较分析,解剖两派作家所面临的话语困境和矛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关注的话语“合法性”问题往往为话语言说与历史叙述树立界标、确立规范,这就带来了作家如何面对“合法性”规范的问题。本书分析“右派”作家与“知青”作家的“归乡”小说,通过分析两派作家对“人民”话语和“忠诚”主题的表现,揭示他们面临的话语困境和局限,同时指出两派作家的不同历史主体意识。以上的内容大都围绕话语的分歧、矛盾展开,目的在于展示话语重建的过程中启蒙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复杂的矛盾交错,揭示意识形态话语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完全意义上的话语权,而是时刻面临着话语的挑战和突破。这也意味着“新时期”之初“话语分流”的出现。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那里,偏于保守和倾向宽容的不同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思想差异,这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出现了分流;而启蒙话语的历史反思和文化批判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分流的情况下进一步得到深化和发展。当然,启蒙话语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存在的,民粹主义的叙述观念与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焦虑结合在一起,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生成。话语的变异和分流使“新时期”的话语格局和话语关系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启蒙话语迅速崛起,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共同构成话语格局的两个重要力量;两种话语出现既有一致又有分歧的复杂关系。

本书的结尾,笔者对总体观点作了一下总结,同时,针对20世纪90年代后所发生的启蒙话语被质疑和挑战的情况,表明自己的观点:启蒙话语的历史性建构并没有最终完成,如果承认中国当下的社会及思想状况还存在着“前现代”的历史景观,还存在着权力的压抑机制的话,那就不能忽视和否定启蒙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不能以非历史主义的眼光武断地宣判启蒙的终结,恰恰相反,启蒙对现实而言并不是日薄西山而正是任重道远。

第一章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重构的最初努力

“新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在“文化大革命”激进政治实践破灭之后产生的，是在历史的戏剧性剧变之后出现的，因此它具有鲜明的颠覆“文化大革命”政治话语的特征。推翻所谓“黑八论”，批判《纪要》，停用“两个口号”，提出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为老干部平反，落实政策等等行动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新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保持了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当紧密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从旧的政治话语中脱胎而出的，在历史的本质论等历史认知逻辑上，在社会价值体系的自我认定上，以及对“十七年”话语资源的借用与表述上，都体现出与“十七年”不可分割的关系。显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以“现代化”以及新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为号召，试图建构新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叙事，以此替代以“革命/阶级”话语为基础的旧的历史叙事；但是，因为与以前的历史话语纠缠不清的关系，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内部的分歧，使这一叙述不时面临着难解的问题。

第一节 文艺政策的调整与“文化大革命” 话语的扬弃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物质损失和心理创伤，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活推向极度混乱、濒于崩溃的危险边缘，所以，在政治变革发生之后，清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问题，治疗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创伤就成为十分迫切而又现实的任务。“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发动的，文学界是“文化大革命”中“受灾”最严重的“重灾区”，在政治领导人着手清理、解决“文化大革

命”的历史问题的大背景下，为文艺正名，为广大作家平反，进而推翻“文化大革命”中所奉为神圣的一系列文艺政策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事了。因此，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新的党的领导人针对文学界的政策调整，便引人注目地开始了。这一调整的过程是曲折的。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旧意识形态的长期推行，使相当一批人的思想难以转变，而当时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又延续着“文化大革命”的僵化思想，使文艺政策的调整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惯性”使当时的文艺界还停留在“文化大革命”话语方式的旧轨道上。正像一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将原来批‘走资派’的作品，简单地改为批‘造反派’的‘改换文学’，甚至一度流行。在涉及文艺规律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方面，长期‘左倾’错误所设置的理论禁区，仍然未能突破。”（张炯，1985）这说明，确立新的文学话语方式并不能够一蹴而就。

文艺政策的调整首先是从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开始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十七年”文艺的一系列莫须有的指控，它的核心是所谓的“黑八论”（所谓“黑八论”是指“写真实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这些理论，都是“十七年”文学中曾经出现过的，对当时僵化的政治书写规范和美学政治化要求表现出偏离和质疑倾向的现实主义理论提法。本质上，他们是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力量的表现，但是因为与激进主义僵化的文学规范相抵触，因此被冠以“黑八论”的政治帽子，本来是学术争鸣性质的问题被上升为“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的政治问题。“黑八论”和“黑线专政论”构成了《纪要》的理论核心，所以，要批判“文化大革命”和《纪要》，对这两个“黑论”的辩诬是必不可少的。

1977年11月，《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茅盾、冰心、贺敬之、刘白羽等作家明确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强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政治镣铐和精神枷锁，只有彻底推翻，才能真正解放艺术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新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同年12月末，《人民文学》也组织了类